2014 年 3 月 24 日 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2003731@tom.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 为何总是热衷于“率先”和“提前”

□宫希魁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无疑是一个万众向往，令人振奋的蓝图，各地周密部署，扎实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努力奋进，本无可非议，且应嘉许。然而，有些地方官员却先声夺人，急不可耐地宣布要“提前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有的城市还非常明确要提前“三年”。此种做法，毫无新意，除了某些官员自我欣赏，感觉良好外，民众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因为这些个花里胡哨的东西，以前不知见到过多少回了。

早在2001年，不少地区或城市都宣布了要在2010年率先实现现代化。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也早已迎来了2010年这个人们曾经期待的时刻。但是，令人非常失望，迄今为止，还未见有哪个城市对社会和公众有个清晰的交代。过去信誓旦旦说过的话，作过的决定，似乎全忘了，好像没那么档事儿似的。作为一个讲诚信负责任的政府，你做出的承诺，你宣布的目标，不是耍着玩的，怎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如果实现了，你宣布一下，让人们都高兴高兴。如果没有实现，也应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符合情理的说明，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到或不肯去做，长此以往，你说话做事还有何信用可言，你制定的那些个规划蓝图还有谁当回事？重提这段往事，并非我有怀旧癖，而是当前的“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当年的“率先实现现代化”冲动如出一辙，不过是某些官员制造虚假政绩，向上邀功请赏的把戏而已。到时会不会不了了之，亦未可知。

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这样的目标，地方当局之所以不宜宣布自己“率先”或“提前”实现，是因为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其内涵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的特点。游离于这种整体之外，企图建立一块块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飞地”，是缺乏整体思维的一种偏私之见。少数城市和局部地区有可能依托资源优势、人文基础、历史遗产、权力干预等条件率先发达起来，但这种“发达”绝不能等同于实现了现代化和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那些制定了“率先”和“提前”时间表的城市和地区，其“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衡量标准大都沿用了传统工业化背景下的一些指标，包括产值、收入、教育、卫生、寿命等10来项内容。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突发猛进，这种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标准已经过时。它过于物化和浅表，不能本质地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和发达程度的全貌，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收入公平与社会和谐等至关重要的内容关注不够。如果把这些内容加进去，局部城市或地区的“率先”和“提前”就很难成立了。因此，地方政府不宜确定本地区这类“率先”和“提前”的时间表。由于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宏观性、战略性特点，地方政府在局部地区内解释现代化和全面小康标准或确定实现的具体时间表，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职能是不相称的。再从科学的角度讲，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目标过程中的许多变量，不是一个局部的地方政府所能控制和把握的。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核心不在到期是否能“率先”和“提前”实现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有些人对这类官员自我标榜而民众不屑一顾的不着边际的目标和口号乐此不疲，屡试不爽？以笔者之见，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目标制定者在制定这样的发展目标时，根本就不关心将来目标是否真的能够实现。他们提出的目标，往往不是从实际和规律出发，而是从彰显政绩的短期功利目的出发，只要能得到上级的赏识，有利于官位的升迁，什么目标都敢提，什么指标都敢超，什么速度都不觉得快，反正都是嘴皮子上的工夫。至于将来能不能实现，那不关我的事。不要说十年八年之后，少则三两年，多则四五年，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做官呢？到那时，“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物换星移，世事沧桑，人海茫茫，有谁还管这档子事。

其次，多年来，一些干部靠吹嘘政绩得到升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有些人靠玩花架子步步得到高升。这些人到了一个地方，不下真工夫解决实际问题，而热衷于出所谓“新思路”，制定所谓“大战略”，搞所谓“大开发”。而且这样的所谓“战略”还没有定数，经常变来变去。这样去搞地区规划，制定发展目标，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这样干的人如果能得到赏识，而且升得还快，那还有多少人愿意花费气力去干实事呢？这真是该罚的不罚，不该赏的赏了，把官场的风气都搞坏了。

最后，制度上缺乏制约，没有问责，大家有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根本就不成立的东西在那里横行却无能为力。也有很多人明知不对，还跟风献媚，推波助澜。最后实践证明错了，没有任何人出来对此负责或付出代价。2006年初，笔者作为专家参与评审某地区行业“十一五”规划，恰逢该地区主要负责人易职。一夜之间，原负责人主导的地区发展理念的关键词要统统从未定稿中删除。昨天很多干部还挂在嘴边的流行语，没有什么人发出通知，突然间大家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废止了这一用语。对此种现象作何解释？恐怕只能这样说，原来人们就普遍不赞同这个用语，但又不敢、不能、不便于提出反对意见。蓄之已久，发之必速，才出现了后来的易人亦易帜，人走政息的情况。这件事太发人深思了。如果制约的力量更大一些，问题恐怕就会解决在伊始或中间，而不会到最后才发生突然的变故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现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过去，这不是说做事不再需要激情了，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社会情况，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做事更要冷静思考，更要科学论证，更要周到缜密。莽撞的冲冲杀杀，简单的大干快上那一套，已经不再适用。用些雷人激进的口号鼓动民众的情绪，其负能量已远远大于正能量。口惠而实不至，与群众感觉和评价甚远的许诺，与其大事张扬，还不如扫地出门，踪影不再。官员政绩如何，不在你“率先”“提前”的高调喊得有多响，而在你实际工作干得怎么样，老百姓最终是否认同。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市委党校）

# 乾隆诗里的“小人物”

□陆 钦

一般说来，皇帝视野里都是文臣武将，昼思夜想的都是朝廷兴亡的大事，哪还顾及小小黎民苍头百姓；而乾隆皇帝则不然，在他的诗词里既描写了风雷激荡、惊天动地、声名远扬的大人物，也勾勒了若干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牧童、山僧、农夫、农妇、轿夫、盐民、说书人、孔丘弟子等等。

牧童以放牧牲畜为本，对牲畜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这一点要比坐在书房里的文人、画家高明。戴嵩是唐代著名画家，以画水牛著称。他画的牛和韩干画的马并称为“韩马戴牛”。可是，有一次，他在一幅斗牛的画中把牛的尾巴画得翘了起来，被一个牧童看出了破绽，指出：两牛相斗，力在角抵，尾巴是夹在中间的。戴嵩听后，恍然大悟，连连称是，改了过来。乾隆帝钦佩牧童的见识，在戴嵩《斗牛图》上题诗：“角尖项强力相持，蹴踏腾轰各出奇。想是牧童指点后，股间微露尾垂垂。”

人生在世，活法不同。三教九流，各有追求。北京西北郊大觉寺的山僧也进入了乾隆帝的诗章：“佳阴禅院重重护，流水僧房处处通。阐士六时无别事，花香鸟语悟真空。”诗句写得很美。佳阴、流水、花香、鸟语，这是山僧生存的幽美自然环境，他们在这里竭力寻觅超出一切的真实境界（所谓的“真空”）。山僧的一大特点是经得起寂寞、枯燥、单调，信仰执着。在自食其力的背景下，苦诵经书，修身养性。佛教把昼夜分为六时，即晨朝、日中、日没、初夜、中夜、后夜。“六时别无事”，即白天黑夜都过着忘却尘世、追求真空的山僧生活。乾隆帝笃信佛教，故对山僧别有一番钟爱。

农夫、农妇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劳动群体。他们种的五谷杂粮、各种蔬菜，是人们能够生存的必备条件。乾隆帝是这样写的：“所怜务本民，忍饥藏种子。勤劬耩湿田，以冀新苗起”。农民的生计是何等的艰辛！他们忍饥挨饿藏下良种，经过披星戴月的水田劳作，期望新苗成长，有个好收成。乾隆有两句很有名的诗句：“朴淳生计耕还织，淡荡心情水与天。”男耕女织这种朴实淳厚的生活让人们和舒的心情犹如水一样的清澈、天一般的辽阔。不仅农民种的庄稼值得珍视，就是他们种的蔬菜也值得肯定：“黄花翠叶满畦芳，伴食无过此味长。”一个皇帝如此赞美青棵大白菜，在中国古代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皇帝出行，不是骑马就是乘车（或船），到了山路就要坐轿。有一次，乾隆坐轿攀登京郊的玉泉山有所感受，写道：“舆者爽而逸，肩者汗且喘。”坐在轿里的，游山逛水是何等的爽快和安逸；而抬轿的轿夫，却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这种对比何等鲜明。爽、逸、汗、喘，这四个字用得很恰当，很有意思，值得回味。

盐民之苦，也反映在乾隆帝的诗词里：“苇芦灶户日煎盐，辛苦蝇头觅润沾。嘘焰胼胝耐燥湿，厚资原是富商兼。”盐民在灶前的劳苦，鲜为人知。用“胼胝”来形容盐民的辛劳，十分准确。胼胝者，手足老茧也。《韩非子》中有“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的描写，在写盐民的苦楚同时，也抨击了富商的盘剥。

盲人说书也很引人注目。中国人有个特点就是爱听故事。不听则已，一听没完。乾隆诗：“瞽目先生小说流，稗官敲钵唱街头。村翁里妇扶携听，侻为欢欣侻为愁。”这首诗出现的小人物有：说书盲人、说书的助手、听书的村翁和里妇。当他们听到动人之处，时而高兴，时而悲伤，多么生动的场景啊，这就是生活。

乾隆诗《子贡庐墓处》：“性天不可得闻闻，庐墓心丧六载勤。楷树至今枯不朽，应同植者意坚云。”这是一首歌颂孝道的诗。以楷树的顽强性格类比子贡，赞美其孝道可嘉。在古代，在父母或老师死后，服丧时期在墓旁搭建小屋居住，守护坟墓，叫作“庐墓”。《水经注 · 泗水》：“今泗水南有夫子冢，即子贡庐墓处也。”子贡庐墓处在今山东曲阜孔林景区内。此诗的大意说，人的孝敬天性难得有这样的见闻，子贡为尊师守墓达六载之久令人感动不已。墓地的楷树虽有点枯干但并未朽烂，它和当年植树者的意志一样坚强啊。孔子大弟子端木赐，字子贡，以口才著称。孔子死后，子贡守墓六年。留下一段孝道的佳话。

乾隆写的诗很多，可以说他是用诗来写日记。所见所闻，动笔即诗。用古人“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的话语来形容他，是比较贴切的。如果有一天不写诗，他可能就觉得心灵的源泉已经枯竭了。我们从他描写小人物的诗章里，可以研究他对客观事物的某种心态。他四处观光，对小人物的观察还是相当深入细致的。作为执政者，没有大量的微观积累，很难形成治国的雄才大略。这也可能是他的一条经验吧。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文史天地

# 校风底蕴

□康井泉

古语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清代政治家魏裔介指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将风气建设和选贤任能并列起来，上升到治国之本的高度尚属首次。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说过：“校风是一个学校内的人物在各方面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和趋向”。

校风形成历时漫长。我国经历了人类文明史特有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文化制约着历代求学执教之风。儒家学说中“学思结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业精于勤荒于嬉”“学而优则仕”等论述，对我们今天的校风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因而“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校风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下跃然涌现；杨贤江先生提出学校培养的人应该有“强健的体魄和精神，有工作的知识和技能，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才干，有丰富生活的好尚和习惯”，至此，“严谨”“求是”的优良风气开始在中国高等院校形成。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环境极为艰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西南联大力主“刚毅、坚贞、自强不息”；还有一些高校倡导“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的风气。

党校校风是在党校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党校人所认同的、体现党校独特的核心价值观的群体意识和精神风貌。她是党校办学理念和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是党校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高度概括，是党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良好的校风能够增强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凝聚力、自信心、自豪感、归宿感。

党校发展历程中历来重视校风建设。在瑞金，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旧历史，当时党校人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风气值得称道。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校长的中央党校一直被视为“红色摇篮”和“革命熔炉”，他们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实事求是”校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党校的方向和旗帜，是党校校风文化的基石，也是对党校校风的拓宽、延伸和具体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校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面对面地向抗大学员授课，亲切自然、平等交流，求知、民主、创新的校风融进了抗大精神，成为立校之基、育人之本。1948年7月党中央决定创办的马列学院，为党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理论干部和宣传干部，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大规模的党校教育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他明确提出，要把中央党校办成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如今，中央党校大礼堂的两侧，还分别写着：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校风是党校文化建设的基石。毛泽东同志说：“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党校要紧紧围绕中心任务，以端正党风为出发点，以端正校风为核心，强化学风、改进文风、改革教风、转变作风，始终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校校训、坚持党校姓党的党校校魂、坚持担当使命的党校基石、坚持从严治校的党校校规。党校校风要成为党风建设的排头兵，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讲话指出：“把从严治校作为党校各项工作的重要方针”，只有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施教、从严管理，培育清正廉明、清风正气、清新致远的校风，党校才能成为党风建设的“领头雁”“排头兵”“奠基石”。

校风建设，重点是“正”、关键是“树”、目的是“促”。“正”：通过摆正观点、提示提醒、治病救人、纠正错误，达到匡扶正气、扬清激浊、修元正本的目的。“树”：通过树新事、树新人、树新风，达到爱党爱校、团结友善、积极向上、崇尚学习、严格有序、生动活泼的目的。“促”：通过展示党校发展成果、团结和谐的精神风貌、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达到促进团结、促进和谐、促进发展的目的。

“历史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有时穿过尘埃，有时踏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径丛林。”请相信：校风是无形的精神力量，可以振奋精神、激励斗志，迸发出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的革命精神。党校人要以一流建设为目标、以一流形象为愿景、以一流作风为品牌，大气、大度、大方，正心、正业、正品，同心、同向、同步，共成党校事、共筑党校魂、共圆党校梦，创造党校的精彩、奇迹和辉煌。

（作者系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副校长）



上海市委党校正门外景

校园风光

# 前桃后杏终归无

□张心阳

题目这句看似如诗的话是笔者信口之语。它源于当下某些领导干部工作上的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即前任栽桃，后任栽杏，思路年年变，口号时时新。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任期大都不会太长，前任栽下桃，后任改成杏，果尚未挂枝，树已成干枝，如此一任接一任地干，不是“终归无”吗？

形式主义有千百种表现，套用一句名言，就是一千个官僚主义行为就是一千种形式主义，而前桃后杏，后任不理前任的事，一个将军一道令，只接权力班、不接事业班，既是形式主义的根源，也是其外在表现。如今，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当“一把手”，权力都很大。既然是新官上任，又大权在握，那总得搞出点新花样，让群众看到自己能力水平就是不一样，让上级认为自己是个事业型干部、开拓型干部，值得进一步培养重用。那么如何一显身手呢？最好就是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思路，搞出点新道道，让人感觉不同凡响。如果一味接着前任尾子干，就觉得没创意，即便做出成绩也让人说是前任打下的基础。出于这样一些考虑，便不假思索地将前任的发展规划推翻掉，另开台、另起灶。有的为了实现这一意图，还以十分漂亮的响亮口号作帮衬，比如“发展要有新规划”“建设要有新目标”“不破旧模式，没有新天地”等等。雄心勃勃，大张旗鼓，煞有介事，让人仿佛觉得真的来了一个开拓创新、身手不凡的好领导。

后任在前任手里接过权力接力棒，不能说不该有自己事业上的一些想法，要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但一定要明白，这个想法和创新从哪里来？我觉得，自接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搞调研，向群众作调研，向专家作调研，向一直在这里工作的其他领导和机关干部作调研。然后对调研材料进行认真梳理，看前任所作的决策和所干的工作，哪些很正确需要接续，哪些不完善需要改进，哪些行不通需要废除。这才是领导干部履新后要迈的第一步，要踢的头一脚，把该接的接好，该改的改好，该去的去掉。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挖掉别人的桃，栽上自己的杏。如果一任接一任地都这么来，还能有结果子的时候吗？那么自己的杏怎么栽呢？应该在自己发现的空地上栽，在去掉不中用的桃树后栽，而且还要确保自己栽的品种更适宜这里的土地，果子结得硕大，有可持续性发展。

当一任领导，追求一些政绩，收获一些名誉，没有错。但好政绩、好名誉，也并不一定都是搞开创搞来的。大汉开国之臣萧何是名相，“萧规曹随”的曹参同样不失为有为之臣。宋代王安石变法名享天下，与之同时期的国相韩琦以务实救世，“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同样被后人誉为“社稷之臣”。当今中国在经济等领域改革步伐较快，缺失更多的是对各种问题的梳理，对政策的调整，对体制的更新，对积弊的清除，需要营造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际和谐、规范有序、环境美好的社会。这些工作都是长期性的，需要积沙成塔、集腋成裘，需要一任接一任地来做。它虽然不像盖大楼、建园区那样让政绩体现在明处，但却是百姓实实在在的需要。不难想象，大楼盖得再漂亮，夜景弄得再华丽，可人们面对早餐一杯奶都要提防有没有毒，那是怎样一个生活质量？

创新与守成，都是领导干部要做的工作。任职有期，事业无限，必须接力。况且，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许多规划和做法，往往都不是前任某个人制订的，而是依据上级政策集体研究决定的，不乏科学性和可行性，后任理应传好接力棒。古人曾在“官经”中说：“今人才识每每不若前人，前人所定章程总非率尔，不能深求其故，任意更张，则计划未周，必致隐贻后累。”说今人的才识不如前人，这话未必对；但认为前人定章“非率尔”，动辄改弦更张，会留后患，这话很有道理。所以，我们不要为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所害，动辄搞劳民伤财的新举措，以致影响和破坏接续发展。

（本文摘自江苏省委党校《唯实》）

党校文摘

启事：本版投稿邮箱因 TOM 网站出现问题，2014 年 3 月 14 日之前稿件全部丢失，请在此日期之前一个月给本版投稿还未刊用的作者，将所投稿件向本版右上角标注的两个邮箱再发一次。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 88 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